

FULIDEMAN
DE
HUOBILILUN
JIEGOU

弗里德曼
的
货币理论结构
——与批评者商榷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



弗里德曼的货币 理论结构

与批评者商榷

密尔顿·弗里德曼等 著

高 榕 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dited by Robert J. Gordon
MILTON FRIEDMANS MONETARY FRAMEWORK
A Debate with His Crit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年
版本(1982年第4次印刷)译出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
与批评者商榷**

密尔顿·弗里德曼等 著
高 榕 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出版社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通县西定安印刷厂印装

787×1092毫米 36开 11.25印张 1780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 定价: 4.20元
ISBN 7-5005-0385-7/F·0346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密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货币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现代货币主义是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最流行和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在最近十余年内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货币主义发源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密尔顿·弗里德曼长期在这里执教，并成为货币主义学派的领袖。1980年，弗里德曼曾来我国访问。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弗里德曼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思想，同时还收录了卡尔·布伦纳与阿伦·H·梅尔特泽、詹姆斯·托宾、保罗·戴维森以及道恩·帕汀金五位美国经济学家对弗里德曼理论的批评意见，以及弗里德曼本人对这些意见的回复。这一新颖的组合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直接、更系统地了解杰出的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理论主张及其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分歧所在。

弗里德曼于191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市，1932

DAC 15/04

年在拉特格斯大学毕业，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还担任过剑桥大学富尔布特讲座讲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编辑部的成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员、皮莱林学会会长，还曾被选为1967年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弗里德曼曾在美国资源委员会、美国财政部赋税研究署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等政府机构担任经济专家的工作，并且是1969—1971年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现在又成为参与制订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的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

鉴于弗里德曼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与货币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及对经济稳定政策的复杂性问题的论证，197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特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弗里德曼的重要著作有：《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与希沃茨女士合著 1963年），《货币最优量和其他论文》（1969年）《自由选择》（1980年）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年《美国经济评论》），《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1970年），《诺贝尔奖讲

演：通货膨胀与失业》(1977年)等。无论在货币理论还是货币政策方面，弗里德曼所表述的观点都是最有代表性的，所以货币主义有时还被称为“弗里德曼主义”。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弗里德曼本人的热情鼓励和多方指导，在此对他表示深深的谢意。我的导师，厦门大学财金系邓子基教授，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还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访问教授范良信先生对本书的翻译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我谨一并向他们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译文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目录

致米格尔·西德罗斯基.....	(1)
导言.....	(5)
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	
密尔顿·弗里德曼 (12)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	
卡尔·布伦纳 阿伦·H·梅尔特泽 (116)	
弗里德曼的理论结构.....詹姆斯·托宾 (140)	
从凯恩斯的观点来看弗里德曼的货币分析 理论结构.....	
保罗·戴维森 (165)	
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与凯恩斯经济学道恩·帕汀金 (203)	
对批评意见的综述.....	
密尔顿·弗里德曼 (241)	
参考书目.....	(326)
作者简介.....	(352)

致米格尔·西德罗斯基^[1]

与会的各位和我一样都是教师。作为教师——
定都会懂得教学生涯中最大的慰藉是什么：它们
来自那些为数极少、难能可贵的学生；他们天资
聪颖，虚心从师，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对教
师的启发作为对教师的回报——这些睿智的孩子
们使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荣耀。米格尔就是其中的
一个。生于波兰长于阿根廷的米格尔几年前来到
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在芝加哥的头一
个学期里他刚好选了我的一门课。由于班级很
大，而且他上课时不常发言，所以我一直没有特
别注意到他，直到第一次考试。这次考试使得我
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从此他便成了一位杰出的
人物。功课一门一门地继续着，我们对他的了解
也在不断地加深。很快我们便认识到：我们面前的
这位学生是注定要搞经济学的，而且是属于那些
为数极少的、能在经济学界独辟新径者之列。

米格尔的智慧，加之他那急于使事情简单明
了的天性，使得他能够很快地抓住问题的要害，
这不仅反映在他的每一篇文章里，而且也表现在

他的每一次谈话中。还有他的品格：诚实，自信而不骄傲，热情，慷慨大度，富有同情心。他的确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所以很快便成了学生中的领导者。

米格尔逐渐对货币理论产生了兴趣。后来他也受到了我的同事、深受青年人欢迎的希罗弗米·乌扎瓦的影响。米格尔不仅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追求严谨的分析论证，而且同希罗弗米·乌扎瓦一样，具有一副清楚的头脑，能够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剔除一切不相关的因素，最后创造出高度概括的简化。也同希罗弗米·乌扎瓦一样，他真正具有经济学家的素质，所以，他不满足于任何一种单纯的数学分析，除非这种分析的结论能够在经济生活中得到有意义的说明。他的论文反映了他的这些优点：这是对复杂的经济问题所进行的一种既内涵丰富又简洁明快的分析方法：既具有数学上的高度精确，又总是起因于经济上的需要，并力求在现实生活中加以阐明。这种方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两年前，正当他完成学位之际，他的未婚妻也来到了美国。结婚以后，他们移居到坎布里奇。在那里，米格尔开始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经济学助教的生涯。我们出于对本身利益的考

虑，希望他能够留在芝加哥大学，并为他提供了留校的机会。但我们同时也告诉他，我们的利益不一定也是他的利益，而且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去对他来说可能更有帮助，更有激励作用。一年以后，当他回来看望我们时，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对他的建议是正确的，他已经找到了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挑战和针锋相对的意见分歧，而且他已深深地感到学术上的分歧对于他及他的同事们来说同样是深有裨益的。当我听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用那么高的赞誉来描绘他的才智、他的品格时，我的喜悦同样是无法形容的。

任何年轻人的早逝对其家庭及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同样，这位年轻人的去世对于我们的事业及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十分令人痛心的损失。这是一位有可能将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有可能改变经济分析方法并促进其发展，有可能启发、引导学生的人，然而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之时，他却猝然陨落了，留下的只是那未酬之壮志。

密尔顿·弗里德曼

于芝加哥大学

注释[1]这篇讲话是1968年9月10日至13日期间在英国

的底特律豪斯举行的美国银行家协会与大学教授年会上为纪念米格尔·西德罗斯基而作的。经《货币、信贷与银行杂志（一）》（1969年3月版）的允许编入此书。

[2]作者发表此篇讲话的时间是在1968年——译者注。

导 言

1963年，密尔顿·弗里德曼与希沃茨女士合著的《美国货币史》（见本书书目索引：弗里德曼1963b）一书问世了。它的问世在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树起了一座丰碑。该书对美国1867--1960年期间货币供给量波动与国民收入波动之间一致性关系的论证，以及关于1929--1933年期间货币供给减少 $\frac{1}{3}$ 应成为大危机严重性与长期性的主要原因的论断，可能唯一地、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在过去十五年中曾经有过的对货币经济学的兴趣。然而，有些评论家却认为该书没能对货币在国民收入决定中的作用问题作出明确的理论阐述，而这种理论阐述能够推导出那些为广泛的实际论据所支持的论断^[1]。虽然弗里德曼很早以前在《货币数量新论》一书中已经发表了他的基本理论方法，但人们仍然对一种更为正式、更为完整的阐述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在这种更为正式、更为完整的阐述中，弗里德曼应进一步分析货币对收入与支出的影响形式，探讨货币-收入

关系的动态均衡，并将他的货币数量理论方法与当时在美国各大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教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凯恩斯学说加以比较^[2]。

弗里德曼以他1970年初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一文来迎接这一挑战（见书目索引：弗里德曼1970a），一年以后，他又增补了一篇文章，叫做《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国民收入的另一个决定模型（见书目索引：弗里德曼1971）。这两篇文章后来被合并到一起，作为一本书由国家经济研究局重新出版^[3]。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的包含弗里德曼这两篇文章的版本，就是我们这本书中所重印的第一部分^[4]。

目前的这本《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是从货币数量理论的四种不同流派的比较入手的：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理论、国民收入方程理论、剑桥大学的现金平衡方程理论及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新论。接下来是对凯恩斯《通论》的基本内容所作的概括，并将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即凯恩斯学派）的分析方法与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们的分析方法加以对比，这一对比主要侧重于凯恩斯理论中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在货币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形式的分析中，假定价格水平为不变，且只对较小范围内的资产加以分析^[5]。

凯恩斯理论与货币数量理论的基本要素被概括到一个“单一共同模型”中去。该模型包括7个未知变量，但只有6个方程式。而这两种理论方法正是分别以这个必须加入到模型中去以便使这个“单一共同模型”得以确定的第七个方程式或被称为“遗漏的方程式”为特征的。简单的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水平不变，简单的货币数量理论则设实际产量水平（即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出水平）为不变，而弗里德曼提出的第三种方法，即“名义国民收入的简单货币理论”却是假设预期实际利率与产量实际长期增长率之间的差额不变。本书的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动态调整问题，分析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对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影响，以及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变化中所包含的实际产量增长率的变动与价格水平增长率的变动因素。

由于弗里德曼的理论作为对经济思想史的评说或本身作为一项理论上的贡献而言，既十分重要又争议很大，所以我从1970年末开始广泛地向许多著名的货币理论家征求对他的理论的看法和意见。令我非常高兴的是，我的大部分请求都被接受了，而且来自于卡尔·布伦纳和³阿伦·梅尔特泽、詹姆士·托宾、保罗·戴维森以及道恩·帕汀金的四篇论文于1971年夏完成，并呈送给弗

里德曼。而弗里德曼对上述批评的回复于1971年末完成。接下来我们在1971年冬至1972年期间内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作者们尽量减少误解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实质性问题上来。这本论文集在1972年9、10月份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正式与读者见面了[6]。

我最初的邀请中并没有任何限制，没有限定某个评论家专门研究弗里德曼理论中的某一方面。所以，评论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复问题，并且涉及的论题很广。布伦纳和梅尔特泽侧重于他们认为重要的因素，但弗里德曼却将这些因素从他的“单一共同模型”中剔除出来——尤其是财政政策，政府有息债券的作用，货币与银行贷款的区分以及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区分等因素[7]。弗里德曼将假设价格不变作为凯恩斯模型的特征，并将假设产量不变作为货币数量理论模型的特征。与此相反，托宾提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价格的固定性或变动性，而是在于假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对利率的不相关性。托宾还批评了弗里德曼在第七个方程问题上的第三种方法，即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戴维森的重点放在了几个方面，特别是不确定性的作用方面。他认为这些方面正是凯恩斯方法的基本因素，但在弗里德曼所定义的凯恩斯经济特征中却恰好漏掉了这些方

面。帕汀金则主要致力于学说史方面，并提出了系统的论据以证明弗里德曼错误地理解了货币数量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要义。所以，他引用了他早期的一篇文章，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弗里德曼的理论结构更多地是继承了凯恩斯的传统而不是货币数量理论的传统。

上述批评意见中所提出的所有主要问题都由弗里德曼在答复中作了说明，这些说明进一步澄清和扩展了最初的论题。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有趣的新材料，特别是他在对帕汀金的答复中所作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芝加哥与“伦敦-奥地利”经济学家在大危机起因问题上不同观点的比较。此外，还有他对凯恩斯《通论》一书基本内容的分析。他认为凯恩斯《通论》中的基本要素不是单一凯恩斯主义的。虽然它们由凯恩斯在《通论》中第一次加以运用，但却是凯恩斯及其他一些人从早期的古典著作中发展而来的。

这一次出版此书的目的，只是想将弗里德曼的原著、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意见以及弗里德曼本人对这些批评意见的回复汇编成册，以便于广大学者、学生进行研究和探讨。尽管有些评论家要求在这本书中同时发表他们对弗里德曼答复的反驳，但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我们无法满足这种要求：（1）学术杂志的惯例是由原作者享有最后的

决定权，而且(2) 弗里德曼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来对他的答复进行修改，以求尽量减少因与批评家们只靠书信联系所造成的误解及各种问题。所以，批评家们没能再一次得到机会，以便对上一段中我称之为“有趣的新材料”的弗里德曼的答复部分进行评价。而且至少已经有一位批评家已向我表示了他的怀疑：即这些资料是否真的做到了新颖合理或中肯。

由于在向批评家们征求意见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版本尚未出来，所以，批评家们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两篇论文来进行评述的。所以，在这本书中，所有的批评家都根据原著27—29页上新增加的篇幅对他们的原批评作了少量的改动。这些新增部分是弗里德曼在将这两篇论文合编为一册，由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时新加进去的。而所作的这些修改是以在戴维森和帕汀金的评述中增加注释及在托宾和戴维森的评述中增加附录的形式进行的。除了这些少量的改动以外，所有的争论都按照原来的面貌保留了下来，读者可以针对其中讨论的那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评价[6]。

罗伯特·J·戈登

《政治经济学杂志》编委